



Resistance and Remembrance:
the German Romanticism Influence in Chinese Literature (1898-1927)



反抗与追忆：

中国文学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1898-1927）

卢文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sistance and Remembrance:
the German Romanticism Influence in Chinese Literature (1898-1927)



反抗与追忆：

中国文学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1898-1927）

卢文婷◎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反抗与追忆:中国文学中的德国浪漫主义影响(1898—1927)/卢文婷
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7-5161-4028-4

I. ①反… II. ①卢… III. ①浪漫主义—德国—影响—中国文学—
文学研究—1898~1927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4392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 彬
责任校对 张玉霞
责任印制 戴 亮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沙滩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lib.cnu.edu.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行部 010-84083685
门市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199 千字
定 价 4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昌 切

探讨德国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是几年前我与卢文婷在讨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达成的一个共识。我们觉得，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既成事实及其成因，可以间接地回答中国人的浪漫主义观念从何而来、如何形成这个更重要的问题。为了避免把线索拉得过长，牵扯的面太大，生出些不便打理的枝蔓，我们商定只做从晚清到“五四”这一阶段，只探讨德国浪漫主义在中国为何“时运不济”、“水土不服”这一个问题。不出两年时间，卢文婷就拿出了成品。从质量来看，卢文婷做得不错，有些部分甚至做得相当漂亮。

由卢文婷来回答这个问题是非常合适的。卢文婷在南开大学文学院求学四年，学士学位论文做的是有关西方文学的研究。本科毕业后经南开推荐免试来到武汉大学文学院攻读文学硕士学位，所选专业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法国的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接下来她转攻中国现代文学，在博士生阶段阅读了大量与西方文学密切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在跨专业和跨文化的教学背景中，卢文婷兼修中西语言文学，形成了较为开阔的理论视野，储备了较为丰富的文学知识，养成了较为敏锐的思维触觉，由此进入中国现代文学，自然能够别具慧眼，发现新的问题，开辟出新的研究境界。

卢文婷追寻“向后看”（寻根，光大民族文化传统）、“向内看”（非理性，崇尚感性）而明显带有“反法国”、“反启蒙”倾向的德国

浪漫主义在中国留下的踪迹，走的就不是一条寻常路。就着德国浪漫主义相对来说在中国抑而不扬、隐而不彰这个基本事实，卢文婷出人意料地探讨了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代表革命和爱情自由的法式和英式的浪漫主义在中国获取正统地位的过程，以及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处于社会巨变中的中国的复杂的精神联系与文化冲突。

探讨法式和英式的浪漫主义在中国获取正统地位的过程，卢文婷并没有从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所熟知、所习用的那些文论入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以小仲马的《茶花女》和拜伦的《哀希腊》在中国的译事或“文化旅行”，以及鲁迅那篇译介西方浪漫主义的名文《摩罗诗力说》为主要的求证材料，细致清晰而富有创意地勾勒出法式和英式的浪漫主义从晚清到“五四”是如何演化的历史轮廓。

据卢文婷所知，《茶花女》和《哀希腊》在西方文坛和西方文学史上的地位，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般显赫，但是，在中国这两个作品却借了译介文字的魔力而备享殊荣，长时间左右着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对西方浪漫主义的认识。从林琴南与人合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风靡于晚清，到苏曼殊等人的仿作和“重写”本接二连三地问世，再到“五四”《茶花女》的旨趣被演绎为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变奏，因应着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需求，来自法兰西的这个比较出色的作品以一种奇异的变相形式一再在中国这个戏台上热闹上演，以至于成为西方浪漫主义的一部鲜活而典范的教材。

另一部鲜活而典范的教材是来自英国的《哀希腊》。它的作者拜伦是个有名的浪荡子。然而，这个成天追逐声色犬马的浪荡子来到中国，并经由鼓吹社会变革的梁启超和马君武的美化，褪去颓废（浪漫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的外衣，成了纯粹的革命和自由的化身，为弱小民族争取解放和独立的民族英雄。也许因心性的相应，在六根不净的“革命和尚”苏曼殊那里，拜伦尚未能脱去颓废的气息，但为不可逆转的中国社会变革的潮流所裹挟，即便是苏曼殊化

了的拜伦，也只能以类似于梁、马所塑造的革命者和民族英雄的形象出现在中国读者的面前。待到《摩罗诗力说》出来，进一步强化了拜伦作为革命者和民族英雄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尽管也有清朝遗老王国维从道德上着眼，有意突出拜伦行为放荡的一面，但由于身份所限和时代所向，他对拜伦的非议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发生什么影响。

从晚清到“五四”，时潮所向是激进的社会变革，是急切的民族更新和国家重构。民族更新和国家重构，构成了西方浪漫主义跨文化传播的中国语境。而正是这个语境，决定了中国文学对不同取向的西方浪漫主义的取舍和抑扬。把拜伦塑造成革命者和民族英雄而不顾及其放浪形骸的行径，重视拜伦而轻待在艺术上优于拜伦的华兹华斯，这与借助感伤情调和追逐爱情甚至革命以抬高《茶花女》的身价而无视法国浪漫主义的德国因缘可谓如出一辙。在这个语境中，问题不在于小仲马和拜伦在法国和英国的文坛上占有何等的地位，也不在于《茶花女》和《哀希腊》究竟有着何等的艺术成色，而在于小仲马和拜伦、《茶花女》和《哀希腊》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正处于急切的民族更新和国家重构中的中国的现实需求。问题应该是明了的，变革中的中国需要的不是以“向后看”、“向内看”为基调的德国浪漫主义，不是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指陈的那种回到过去、面向乡村田园的浪漫主义，而是“向前看”、“向外看”，面向都市和未来的浪漫主义。因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就是入不了中国人的法眼，在中国走红的反而是最像英国人的鼓吹革命的海涅，为什么华兹华斯在中国的影响力远不及拜伦，为什么《茶花女》的主旨在中国会发生偏转，为什么巴尔扎克露骨礼赞中世纪庄园生活的倾向在中国会被遮蔽……

从发源地到输入地，经由时空的转换，弃取由便，变调或变相的呈现是难以避免的。浪漫主义运动在德国起来的时候，德国只是一个在法国辖治下的较为松散的邦联国家，也就是说，它还不是一

个现代意义上的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法国的辖治唤醒了日尔曼人的民族意识，民族统一的渴望激起了日尔曼人追溯续写本民族优良传统的热情。于是，“向后看”，寻根以建立民族文化的精神谱系；“向内看”，崇尚感性以抗拒法国的启蒙理性，便成了德国浪漫主义在这个背景中的必然选择。然而，若干年后，当西方浪漫主义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中国的时候，情形完全不一样了。同样是对付外来势力的干预，同样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当时中国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文化实践中所采取的基本策略居然是否定自我，向“他者”学习。从晚清到“五四”，从梁启超、严复到胡适、鲁迅，为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所迫，他们一直是在自我贬损中寻找“新民”、“富国”的途径。在这样一种背景中输入西方的浪漫主义，取英、法而舍德国当然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的选择，而对于英式和法式浪漫主义的转承、“重写”和变相呈现，也当然是受制于此“势”此“理”的结果。

不过，“势”、“理”如此，“事”则未必尽然，有些出入也是难以避免的。可贵的是，卢文婷敏锐地发现了未必尽合此“势”此“理”的一些事实，并给出了她的解释。

卢文婷主要发现了两个方面的事实，即体现在作品中的类似于德国浪漫主义的主题和叙述策略，文化选择上的民族和民俗倾向。例如，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和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等作品，影子/身体、光明/黑暗和健康/疾病等隐喻，被她用来验证前一个方面；周氏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多取材于北欧的弱小民族，刘半农、顾颉刚和周作人等人在“五四”前后对中国民间歌谣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学衡派倡导“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被她用来验证后一个方面。通过这两个方面的验证，她意在说明：从晚清到“五四”，尽管德国浪漫主义与中国社会变革发生了方向性的冲突，但是作为一种强大的西方文化思潮，它仍然有可能在中国作家的创作和学人的文化实践留下它的踪迹。

实际上，面对蜂拥而来的西方文化思潮，中国的接受者不可能

一是一、二是二，分辨得那么清楚，各取所需的混搭应用倒是更为常见的一种现象。譬如鲁迅，一方面他在《摩罗诗力说》中推崇“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摩罗诗人，一方面又在同时期的文章《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中指责现代文明唯物主义即极端功利主义的“偏至”，认为真的精神仅遗存在尚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乡野——民间。可见西方浪漫主义互逆的两面都在鲁迅的头脑中留下了印记。因此，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既能明显地看到“任个人而排众数”的“超人”似的“复仇者”的偏执狂放的行径，又能深入地发现隐含的光明/黑暗及其变体影子/身体的隐喻结构。

“五四”前后的民俗学运动，表面看来，在方向上与德国浪漫主义是一致的，周作人等人发掘民谣就近似于格林兄弟搜集民间故事。事实上，从动机和目的来看，二者在大方向上是背道而驰的。周作人之所以要发掘民谣，原是为了迎合白话文运动的需要，为白话文寻找历史的依据，为其正名，而并非要光大民族文化辉煌的传统。不为光大民族文化辉煌的传统，却做了与要光大民族文化辉煌传统的格林兄弟相近的工作，德国浪漫主义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在中国找到了它的知音。其实，周作人不过是不问目的的误置，他并不是德国浪漫主义在中国真正的知音。鲁迅和郁达夫也不是，学衡派更不是。

学衡派的西方导师是白璧德主义。白璧德主义属于新古典主义，而新古典主义的天敌正是浪漫主义。卢文婷高明的地方在于，她从小里看到火，从敌人那里发现友人，从新古典主义反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人文主义倾向中看出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因素。用她的话说：“浪漫主义—民族主义的诱惑，先天性地存在于人文主义中……在《学衡》的个案中，这种充满焦虑的诱惑又被五四浪漫主义的时代精神渲染得更加热烈。因此，尽管《学衡》的文本中充满反浪漫主义言论，但浪漫主义却借助人文主义修辞隐蔽而顽强地指

导着《学衡》的理论与实践发展。当《学衡》不断征引白璧德证明儒家传统的优越性时，他们事实上也在发展着德国浪漫主义的典型观点——回溯民族传统。”

鲁迅和郁达夫所运用的那些隐喻，如果说是德国浪漫主义作品的呼应的話，那么这种呼应充其量只是无意识的暗合，其所喻指的对象肯定是大不一样的。《野草》中光明/黑暗及其变体影子/身体的隐喻，实质上是鲁迅处在“五四”落潮期感到进退失据，不得不“彷徨于无地”即明暗之间的真实心境的写照。《沉沦》中疾病/健康的隐喻，经郁达夫放大，被赋予政治含义，指向了国家，作为个体的人物（男女）之间的关系竟然被主人公臆想成了“弱国子民”与强国公民之间的关系。不管是鲁迅还是郁达夫，作为“五四”的启蒙主义者，他们在精神上怎么讲都不可能划到“反法国”、“反启蒙”的德国浪漫主义的那条道上。

历史总是在参差中行进的，否则何来踟躅、反复、倒退之类的说法。事不尽理或许也与那些先觉者陷入情感与理智两难选择的困境有关。从情感上讲，他们无法割舍民族情怀，斩断民族文化血脉，净身出户；从理智上讲，他们又必须忍痛割爱，否定自我，向“他者”学习。如同当时的政治实践，一方面是抵抗西方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一方面是认同和顺应西方文明先进、中国野蛮落后的逻辑，主动地“他化”；当时的文化实践，一方面是开掘民族文化资源，建立“文化自觉”，树立民族自信，一方面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权衡民族文化的利弊，为民族文化融入世界文化鸣锣开道。“五四”以后空前绝后的大规模的“整理国故”的活动，大都属于后一方面的文化实践。不是为了“昌明国粹”，却于面向世界和未来的“融化新知”的文化实践中不经意地为不受待见的民族文化悄悄地“回娘家”开了一扇后门。也许唯有如此才足以消除情感与理智的分裂所带来的痛楚。痛楚可以消除，但潜伏在消除痛楚的面向世界和未来的文化实践过程中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截然相反的两种意向，

却永远地留在了那些让后人“费思量”索解的文本之中。卢文婷的触觉确实是敏锐的，她透过扑朔迷离的谜面所看到的，正是隐含在“五四”前后那些文本中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背反式存在的谜底。

看穿“五四”前后文化实践的两面性，揭示德国浪漫主义潜在的影响，由此可以见出卢文婷做工的细致和创意。借助《茶花女》和《哀希腊》等文本的异国奇遇，揭示英式和法式的浪漫主义与德国浪漫主义在中国不同的命运，由此同样可以见出卢文婷做工的细致和创意。在我看来，这两点是卢文婷这篇论文最值得称道的地方。由后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中国人如何弃取、为何如此弃取西方浪漫主义的问题，了解中国人对浪漫主义特定的认知。由前一点，我们可以发现跨文化交流那副复杂的面容，体验近百年前西方浪漫主义那场奇异的中国之旅。

2013年7月4日

(881)	付録英文辞書——
(321)	浪漫主義の発展と、明治時代の人々
(171)	「狂言」の発展と、明治時代の人々
	付録英文辞書、明治時代の人々
	「狂言」の発展と、明治時代の人々

目 录

序	(1)
引言	(1)
第一章 放大与遮蔽:接受浪漫主义	(6)
第一节 法国浪漫主义的晚清面容 ——《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文化旅行	(7)
第二节 《哀希腊》与浪漫的革命者:苏曼殊与拜伦的 身份融合	(25)
第三节 《摩罗诗力说》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经典化	(42)
第四节 被遮蔽的暗流:失声的德国浪漫主义	(57)
第五节 个案之一:《野草》中的德国浪漫主义主题	(73)
第二章 失落与寻回:民族主义	(89)
第一节 对立的隐喻:健康与疾病	(89)
第二节 浪漫主义—民族主义	(95)
第三节 身份焦虑:从天朝子民到弱小民族	(98)
第四节 折中的策略:身体民族主义	(108)
第五节 个案之二:冯至《河上》中的政治民族主义与 文化世界主义的冲突	(126)
第三章 反抗与追忆:新语境中的旧传统	(138)
第一节 对立的隐喻:光明与黑暗	(139)

第二节 语言战争

——重构文化身份 (146)

第三节 周作人与顾颉刚：民俗学的双重变奏 (156)

第四节 浪漫的古典：《学衡》的理论困境 (171)

第五节 重释传统：反讽、断裂与追忆

——以《补天》、《孤竹君之二子》与《昨日之歌》

为个案 (187)

(1) 索

结语 民族传统与民族身份 (206)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18)

(2) 许广文《中国文学史》

《补天》与《孤竹君之二子》：革命与传统的断裂 章二第

(23) 合源何良

(24) 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 章三第

(25)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四第

(26)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五第

(27)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二第

(28)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一第

(29)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二第

(30)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三第

(31)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四第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五第

(32)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六第

(33)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三第

(34) 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 章一第

引言

浪漫主义的界定，一直聚讼纷纭。一般说来，可以分为如下五种主要思想倾向：第一，东方浪漫主义，通过东方来寻找西方文化的未来；第二，宗教浪漫主义，试图重建人间天国；第三，感伤浪漫主义，以内心生活为探索的主题；第四，民间与传统浪漫主义，以民间与中世纪传统来建构民族身份；第五，革命浪漫主义，致力于以暴力摧毁旧世界。在浪漫主义文学史的描述中，以拜伦为代表的革命倾向一般被指认为英国浪漫主义，以雨果为代表的东方与中世纪倾向是法国浪漫主义，而回归内心与民族传统的倾向则是德国浪漫主义。在较为宽泛的意义上，德国浪漫主义包括早期的歌德与席勒，耶拿、海德堡、柏林与施瓦本浪漫派^①，以及海涅与青年德意志。然而严格来讲，尽管歌德与席勒的作品中包含了东方、魔鬼与革命等浪漫主义主题，但其主导精神却是以一种推崇理性的新古典主义对抗此前德国对法国文学幼稚简单的模仿——归根结底，仍旧指向古典主义。而海涅这位浪漫主义的伟大解构者，通过反讽这一浪漫派的利器，将浪漫主义的黑夜、女神、骑士与恶魔驱逐出了主流文学，而以现实主义取而代之——在某种程度上，海涅终结了德

^① 耶拿浪漫派提出了浪漫主义的核心主张，主要包括施莱格尔兄弟、蒂克、诺瓦利斯、谢林以及费希特等人；海德堡浪漫派发展了浪漫主义民俗学，包括格林兄弟、布伦塔诺、阿尔尼姆等；柏林浪漫派继承了浪漫主义主题，在此基础上，E. T. A. 霍夫曼对怪诞（grotesque）与惊悚（fantastic）的兴趣启发了现代主义；施瓦本浪漫派的豪夫与乌兰德则将一种南欧的明媚带入了德国文学。

国的浪漫主义运动。

浪漫主义兴起于 18 世纪末的德国，其主导思想是“向后的”与“向内的”，即通过回归中世纪来寻找德意志民族传统与民族精神。19 世纪初德国浪漫主义逐渐向欧洲各国扩散，英国追随者瓦尔特·司各特、湖畔派与法国追随者雨果、巴尔扎克等人都继承着德国人的中世纪情结，以传统来对抗现代，以历史来对抗当下，或者用阶级论的措辞：以封建骑士精神对抗资产阶级的庸俗（Kitsch and Cliché）。在集体追忆古代的同时，浪漫主义内部也经历了多种指向的分化。从来没有同情过浪漫主义中世纪的拜伦，将目光转向东方，并将蒂克等人的浪漫主义反讽嫁接到东方——英国这一准现实主义语境之中，并通过参加希腊革命而成为世界级的浪漫主义偶像。除此之外，雪莱、济慈与戈蒂耶精雕细琢的作品，通过拉斐尔前派、波德莱尔与邓南遮等人启发了 19 世纪末的种种新浪漫主义流派。国内学界所通行的浪漫主义定义，将浪漫主义界定为“反封建”、“反神权”，显然以“革命”的拜伦作为浪漫主义的唯一参照系，将各类浪漫主义作家一概并入革命浪漫主义系统，而并未考虑到“封建的”、“神权的”中世纪传统才是浪漫主义的根源主张。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五四”浪漫主义似乎已有定论：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影响而产生，以启蒙与革命为核心，经过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后逐渐落潮，以激情、感伤与个性主义为基本风格。在这一国内学界所普遍接受的文学史框架内，现代文学学者们对“五四”浪漫主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通过作品个案的研究，对上述框架进行补充，而鲜少质疑。现代文学界对“西方浪漫主义”权威概念的集体无意识，可能是这种学术盲点的根本原因。在众多浪漫主义研究中，浪漫主义常常被指认为一场“在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便形成了遍及全欧洲的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拜伦、雪莱、歌德、席勒、雨果、乔治·桑、莱蒙托夫等一大批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适应着时代和阶级的要求，在作品中以丰富的幻想、大胆的

夸张、火热的激情表现出蔑视权贵、歌颂叛逆、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这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作为新兴阶级代言人的作家，要求反对神权、反对封建思想的强烈愿望在文学中的具体映现。”^① 这一将拜伦、雪莱等人作为经典作家，将反抗神权与封建思想、个性解放作为基本主张，将幻想、夸张与激情作为风格标签的浪漫主义定义，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界对西方浪漫主义的主流理解。这种理解即使不能说是错误的，至少也是极端偏颇的。

在这种误读之下，国内学界对“五四”浪漫主义的理解显然也出现了偏差。“五四”初期中国文学在接受浪漫主义时，并没有条条框框的学派限制，各种主张的浪漫主义都对“五四”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但当半个世纪之后的学者试图去阐释“五四”浪漫主义时，以革命浪漫主义为核心的浪漫主义文学观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浪漫主义即是“积极”浪漫主义，即使历史上曾经存在着“消极”浪漫主义，这种“消极”浪漫主义的次要作家与次要作品也并未真正对“五四”浪漫主义发生影响。单一的革命指向再次压抑了“五四”浪漫主义的多重影响维度与美学尝试。在处理“五四”浪漫主义文学时，现代文学研究界普遍存在着如下两种范式。第一种是概论式。这一类著作数量颇多，但总体上并非超越流行的浪漫主义框架。启蒙与革命仍然是论述浪漫主义的核心，但启蒙概念在浪漫主义范畴内常常被解读为感伤与个人主义，而革命浪漫主义则常常指向郭沫若、蒋光慈等左翼作家。颇具代表性的作品有余兆平《浪漫主义在中国的四种范式》、朱寿桐《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史论》、贾振勇《理性与革命——左翼文学的文化阐释》、汤奇云《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思潮史论》、王玉珠《论“五四”文学的感伤情调》等。第二种则是个案式。论者常常遴选某个在文学史上已有定论的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如郭沫若、冯至、郁达夫等，试图

^① 栾梅建：《重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艺思潮的起源及其流变——从近、现代社会的转型出发》，《文艺争鸣》2010年第5期。

再次寻找证据支持其作为浪漫主义经典作家的地位，或者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寻找这些作家与其异国启发者的精神联系。这种做法固然希望能够扩大阐释空间与阐释能量，但常常由于缺乏宏观文学史的视野而无法真正实现其目的。近年来的作品包括于轶婷《论郁达夫创作的感伤风格与欧洲文学的关系》、袁荻涌《郭沫若与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秦林芳《浅草——沉钟社研究》、殷丽玉《冯至与德国浪漫文学》、陈永志《〈三叶集〉——新文学浪漫主义的第一面旗帜》、姚春树与汪文顶《论郭沫若和康德》、陈旭《推崇自由、追求个性——英中湖畔派抒情之比较》等。

对浪漫主义的误读，使论者常常忽略德国浪漫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在现代文学史的建构中，革命倾向被描述为浪漫主义的主流诗学，并试图将“五四”浪漫主义作品全部纳入这一阐释框架。当拜伦式的革命浪漫主义成为主流时，与拜伦倾向相似的雨果、海涅等人被视为合法的浪漫主义者，而作为欧洲浪漫主义根源与主要流派的德国浪漫主义则被排除到了学界的视野之外。面对“五四”文学的启蒙与革命诉求，新青年社、创造社、文研会、语丝社、浅草—沉钟社等文学社团引进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视其为广义浪漫主义的一部分。创造社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引进，强调其与法国启蒙运动传统相契合的部分，强调以一种理性、积极、进步、革命的“向前看”的视角观照现实。在这种革命与启蒙的话语背景下，海涅、席勒与特定时期内的歌德被视作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作家，他们身上的革命色彩也被过分强调。但在接受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过程中，中国知识界规避了德国浪漫派的另一重属性：德国浪漫主义中反对法国启蒙传统、“向后看”、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诉求，因其与“五四”反传统思潮相悖而被有意识地忽略了，以施莱格尔、格林兄弟、谢林与费希特为代表的追寻民族历史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被排除到了主流浪漫主义之外。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国家诉求与“五四”作家的强国梦想在本质上虽然契合，却因具体方法的分歧而在接受

中被压抑。

文学史的建构忽略了这一事实：虽然革命在 20 年代后期逐渐成为浪漫主义的关键词，但“五四”初期众声喧哗的浪漫主义译介与移植也确实影响着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在飞扬纵横的英国式革命浪漫主义之外，“向后”与“向内”的德国浪漫主义以一种更加沉潜的暗流形式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的走向，涵盖了中国现代性转型中较重大的两个命题：民族主义与古典传统。对这两个命题的理解，不仅涉及如何阐释“五四”以来的经典作品，同时也意味着对当下文化现实的种种追问。简单地将“五四”以来的文学与政治抉择解释为“激进主义的反传统”或“革命压倒启蒙”，显然既无助于理解历史，更无助于理解现在。在学界仍然普遍将浪漫主义描述成拜伦主义时，深入探讨德国浪漫主义对“五四”浪漫主义的影响，也就不仅仅是要在已有的研究之外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更需要通过梳理“五四”浪漫主义的学理脉络，来寻找描述文学史的另一种途径，进而将目光投向此在：传统还是西化，民族主义还是世界主义，新儒家、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种种“新”争论，讨论的仍是“五四”的老问题——在西方的冲击下，传统与民族身份究竟何去何从。